



杨教先生序

心碑献给“地狱之门”的思想者和蒙难者

—

捧读武宜三先生主编的《1957年受难者姓名大辞典》，我对历史与现实充满困惑与忧思的情愫，又一次受到深深地震撼被激活了，脑海里浮现许许多多认识或接触过的受难者的鲜活面容。其中，作为师辈的有冯雪峰、王中（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著名新闻学家）、彭子冈（《大公报》著名女记者、上海《文汇报》编委、北京《旅行家》主编）、杜光（中共中央著名理论家）等等；作为同辈同学的有林希翎、林昭、甘粹、丁弘等等；他们都是研究“一九五七学”不可忽略的人物。除杜光先生已年逾九旬现尚健在外，余者多先后辞世，活着的受难者已经不多了。想起他们，便让我想起那个难忘的“秦始皇+斯大林”的黑暗年代！

1957年“反右运动”的受难者究竟有多少？至今还是有待破解的谜。按通常的说法是55万（一说是300多万），人们常常误以为这是1979年在胡耀邦主持下得到“改正”者的数目，直到时隔数十年的2016年，我才从《炎黄春秋》第8期读到一个令人心寒的数字：“55万右派分子中能活到沉冤昭雪的只有10万多人。”（孟半戎：《原来“章罗”是这样“联盟”的》），这就是说，有40多万的“右派分子”，早在各种政治运动中被迫害，在“劳改”中被折磨死了。如按300多万计，死亡者更多得惊人。杜光先生2017年5月18日在上书党中央《呼吁彻底否定反右运动的建议书》中喟然感叹说：“这个蒙难群体的成员大多数已经离开人世，尚存者恐不足万数”。（《杜光文存》2017.4--6）

这种时代背景，更彰显出武宜三先生的功绩与本辞典的历史价值。大家知道，大陆主管意识形态的官员们，普遍患有阿Q式的陋习，只要提到犯忌讳的“光”、“亮”、“灯”、“烛”之类的字眼，他们就会联想到自己头上的癞疤，故此要“全疤通红的怒目而视”也。所不同的是，没人把阿Q的“怒目而视”当回事，而这些犬儒似的官员，却可把“怒目而视”演化为文化专制主义，用“红头文件”的方式规定不准“说三道四”之类的“党的政策”，从来就不顾及这类“政策”，与他们虚伪

宣传的“遵守宪法”完全相悖这一事实。“反右运动”是被他们明文规定的不准“说三道四”的主要内容之一，这是有案可查的。在这种思想禁锢得像鲁迅所说的“铁屋子”的情况下，要像大浪淘沙似的，从海量文字中点点滴滴搜索 60 多年前“反右运动”受难者的材料，谈何容易！没有忧国忧民的赤子情怀，没有追求真理的满腔热忱，没有还原真相的求实精神，要完成这种本该动用国力才能完成的国家级科研项目，武宜三先生却用单薄的民间力量完成了，而且是在周围充斥着铜墙铁壁式的“安全力量”的重压下完成的，这实在令人敬佩与感激！

因此，每每想到这位未谋一面的武宜三先生，我眼前就浮现这样一幅群像：他们是新时代的中国罗丹，日日夜夜攀登在一座峻峭、荒凉的花岗岩上，艰苦地挥动着手里的榔头和凿刀，在一声接一声的敲击声中，为中国的“地狱之门”雕塑着一座顶天立地的“思想者”和数不清的蒙难者；他们的劳动，使活着的人们又想起和认识这些被封沉于历史幕后被遗忘的灵魂。他们在“地狱之门”发出的呻吟声，渐渐形成惊雷般的呐喊：呼唤着沉睡在“铁屋子”里的人的觉醒。武宜三先生在这里列举的“受难者”，其实都是矗立于中国“地狱之门”的“思想者”和受难者；他们发出的呻吟声，也就是禁锢在“铁屋子”的先觉者吼出的呐喊声！

二

在我认识的同辈同学受难者中，有已在“文化大革命”中强烈反抗毛泽东的“秦始皇+斯大林”执政理念惨遭枪杀的林昭，是我们这群“学生右派”中唯一曾在一起“劳动改造”的女孩子。她正直、坚强、聪慧、美丽，我们都亲切的称她为“林妹妹”；原在北大就读，后集体转入人大新闻系。她因敢于直言被划“右派”，又因“坚持反动立场”获罪入狱。她年迈的母亲含泪劝说她：“你认个错吧，不然，他们会杀死你的。”她的回答是：“我没有错！”她囚禁于上海监狱多年，深知即将被杀，用自己的鲜血在中共中央党刊《红旗》封面上书写一首明志诗，其中有句云：“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他日红花发，认取血痕斑。”写完此诗仅一个多月，即 1968 年 4 月 29 日，她被枪杀了，刽子手还向她母亲索取了五分钱的子弹费；在她押赴刑场时，整个监狱、整个上海、整个中国，都听到了她最后的惨烈呐喊声：“妈妈，你在哪里！”

在我认识的师辈受难者中——

冯雪峰，1927 年参加共产党，著名文学评论家。鲁迅挚友，许广平赞其为最理解鲁迅的通人。1976 年 1 月 23 日含冤逝世”。

1956 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时，我刚 20 出头，热衷于学生文学社团活动，如参与《人大周报》文艺副刊编辑与写作，与文学名人交流等等。我曾写信向冯雪峰请教鲁迅研究问题与他有信件来往。在反右高潮中，我被领导勒令交出彭子冈、冯雪峰的私信，这些信件后全部丢失。

年逾九旬的杜光先生是位至今健在的，深受人们尊敬、爱戴的著名学者。早在建国前他在北京大学读书的青年时代，即积极投身反抗国民党腐败统治的学生运动，建国后在中共中央党校从事科研教学工作，一直深切关注国家和人民的命运，不断探索与追求真理。由于他的科研活动不是为了谋求一官半职的

“敲门砖”，不是用以注疏皇朝“金科玉律”的“帮闲八股”，因而未能做到与统治思想“保持一致”，他的科研活动姓“科”不姓“党”，这就招来一生的厄运。先是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1979年获平反重返中央党校，又在“六四运动”中因同情与支持学生遭到整肃，被撤销所任职务。进入晚年，他致力揭露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科学上的卑鄙”，对钱理群教授倡导的“一九五七年学”，奉献了奠基性的科研成果，得到学界有良知者的热情欢迎与支持，是一位领军式的长者。我曾用他的名字作联赞扬他的人文品德：“杜宇啼夜，光风霁月”。其实他的本名叫“林道茂”，为了躲避国民党军警的追捕，才改名换姓投奔“解放区”参加了共产党。就是这样一位正直、真诚而善良的老学者，今天仍屡屡受到种种有形无形的思想禁锢，直到用强制手段扼杀他的发声空间。当年国民党军警想囚禁他的图谋未能得逞，现在却由共产党用另一种方式把这个老共产党员的思想与行动“囚禁”起来了。

这仅仅是从我身边随手拈出的一老一小（都是人才辈出的北京大学学生），就不难看出他们是些怎样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统治者又是依据怎样荒唐的法律判决他们有罪的。如有可能，当我们从这本《1957年受难者大辞典》中，逐一追踪每个受难者的来龙去脉，知晓他们的人文品德和人生轨迹的话，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又将是怎样一幅惊心动魄、骇人听闻的惨烈画面！

这使我想起了1980年12月11日，北京的部分文化名流，北大和人大的新闻系师生和林昭生前友好，在违背官方意志、冒着政治风险，举办了一次小型的悼念会：正面黑色帷幕上是同窗、难友吴尚宇写的横幅“林昭同志悼念会”，正中高悬着白花环绕的大幅林昭遗像，两边挂满白色挽联。其中特别醒目的是遗像近侧挽联却是无字的，画的是两个硕大的符号：右边是问号“？”，左边是惊叹号“！”。这种“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寓意，恰如鲁迅的诗句：“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从1957年“反右运动”到今天，中国又发生了大量让人流血流泪、不堪回首的可悲事件，“党的领导”者对此却集体失声，装聋作哑，“王顾左右而言它”。究竟是什么使这个背负血债的党丧失了记忆？这也是可以用这幅无字挽联“？”和“！”去思考的，人们将在“天问”似的质疑中，找到惊天的答案。

三

在高官们隆重纪念这个多少周年、那个多少周年时，不识时务、不合时宜的杜光先生，却在“反右运动”六十周年的2017年，上书党中央呼吁彻底否定“反右运动”，认为“反右运动”是党在历史上留下的一大错误，一大遗憾，一大负担，如能彻底否定，就不仅可以彻底纠正党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消除遗憾，卸掉负担，而且会大大改善党在广大民众中的影响和国际上的形象。他为此提出了六点建议：

- 一、撤销反右运动是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论断；
- 二、更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对反右运动所作的

错误结论（即反右运动是正确的、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认为这个结论的根据纯属子虚乌有，必须推翻；

三、对反右运动的受难者进行经济赔偿；

四、对迄今尚未改正者，一律予以改正平反；

五、在有纪念意义的地方建立“丁酉蒙难者纪念碑”；

六、民间自发成立的关于丁酉年反右冤案研究组织，及举办与此有关的学术与纪念活动，应按宪法规定给予支持，不得干预阻挠。

结果如何？根据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完全可以肯定，杜光先生这些出于一片真诚的建议，不会有任何结果，甚至连一纸收条都得不到；这种没有结果的结果，才是真正的结果。何也？因为毛泽东所说反右运动“是一个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论断，以及党中央在“历史决议”中关于“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共产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的结论，都是违背客观事实和理性逻辑的，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从理性逻辑上说，上述论断与结论，完全混淆颠倒了部分与整体、个别与一般、量变与质变的正常关系。在这里，百分之百的错误，也改变不了先验百分之百的“正确”规定性；从客观事实来说，上述论断与结论，不是从外在的客观存在中抽象出来的，而是内在地先验存在于头脑中而后强加于客观存在的，所以这种论断成了论证客观存在的出发点，是完全不需要得到客观存在的印证与检验的。可以看出，高官至今为了政治利益需要，仍然在坚持这种讲不通的立论方法，是与毛泽东立下的“规矩”、“传统”、“惯例”是一脉相承的。

能用“宪法规定”劝说口头上一再宣传的“遵守宪法”的“党的领导”者吗？答案是否定的。在现阶段的中国，事实上存在“党大于法”的“铜墙铁壁”情况下，主流意识宣扬的“遵纪宪法”之类的漂亮言词，不过是权势者欺骗民众的花拳绣腿，从来经不起实践的检验；谓予不信，就让他们从最简单的、明白无误的允许言论与出版自由做起试试？官方关于“遵守宪法”的虚伪性，与毛泽东自诩“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天性完全一致。有文献记载，早在1954年宪法讨论会上的发言，和1957年秦皇岛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就毫不隐瞒地表明过他对宪法的根本观点：“制定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是极其有害的……宪法制定是制定了，执行不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还要以党的指示为准。只有傻瓜和反党分子才会脱离党的领导，执行宪法。”由此可见，宪法不过是共产党手中玩弄“政治”与“民主”的小把戏，有用则用，否则弃之，一切以是否有利于“党的领导”为原则。听了毛泽东的“私房话”，再看看大量众所周知的事实，他们声称的所谓“共产党要在宪法范围内进行活动”，实在是十足的欺人之谈。这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刘少奇这个“国家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手举宪法的“本本”以求自保时，却遭遇到一贯“无法无天”的毛泽东这个“党的主席”的当头棒喝，在毛的眼中，“宪法”对刘是根救不了命的稻草。这样一来，作为当

年因倡导“毛泽东思想”受到毛泽东信任的“第二把手”刘少奇，最后竟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成为血祭“毛泽东思想”神坛前的牺牲。某位党的顶级高官宣称：“党大于法”是个伪命题应于否定。但无数血的事实证明，“党大于法”是个铁板钉钉的事实，应于否定的倒是那些不敢面对事实的“党的领导”者。他们一再强调的“党的绝对领导”，在现行体制下具有不可侵犯的神圣性，是产生一切腐败之源，这正印证了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1834-1902）的有普世价值的论断：“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当有人言必称“党的绝对领导”时，他们似乎连常识性道理都忘记了。向这些官僚为五七受难者发出理性的呼吁，回答仍然是林昭遗像前高悬的两个无声大符号：“？”“！”

四

事情当然不完全像我所说的那样悲观。毛泽东“驾崩”后，他建国以来的所作所为，随着民众的觉醒也渐渐昭然若揭，1957年最先站出来与其进行斗争的受难者，也渐渐为在十年浩劫中饱经苦难的民众所理解。“以阶级斗争为纲”伴随毛泽东生命的终结而终结，虽然其幽灵像坟堆的鬼火，在黑夜里时常闪现，但在光天化日之下，已经无奈的躲进坟堆的阴暗深处了。于是，“反右运动”的“正确”与“必要”的结论，和毛泽东所云它是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论断，都在民众茶余饭后的嘲笑声中遭到完全否定。有个普遍的社会现象是值得品味的：提到当年被当作“贱民”与“敌人”的“资产阶级右派”，现在常常被人赞誉为“好人”与“能人”；而曾经响当当、当当响的“无产阶级左派”，现在几乎变成了骂人的脏字，要想背后说句损人的坏话，只要称谁谁是“左派”就足够了。现在还有谁像“文化大革命”中那样，敢于拍着胸脯自称是“左派”呢？

但事情往往又使我不得不悲观。杜光老先生在致中共中央《呼吁彻底否定反右运动的建议书》的第五点，提到在有纪念意义的地方建立“丁酉蒙难者纪念碑”。他说：“反右运动是我国近现代历史上的一大冤案，给中华民族带来极大的灾难。它不但把大量知识分子打入社会底层，使他们无法对社会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许多优秀的中华儿女在劳动改造中死于非命，而且摧毁了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败坏了社会风气。这个历史教训值得永远记取。为了使子孙后代铭记这个惨痛的教训，避免重犯类似的错误，应该在划出大量右派分子的大学校园内，在有大量右派分子死亡的劳改场所，建立‘丁酉蒙难者纪念碑’。”

这一建议完全合情合理，顺乎民心，合乎民意，是绝对必要和可行的。但在日前无往不在的“党的领导”体制下，连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说的“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话，也当作“圣谕”搬出来吓唬人，更别说主流意识至今仍不愿放弃第三国际的“正统”衣钵，更不敢也不愿认真地正视历史、吸取历史教训。因此，建立这样的纪念碑，无疑等于揭掉了阿Q头上的毡帽，把他头上的癞疤暴露在阳光之下，有损其“光伟正”形象；封建王朝的皇帝有时尚且能下“罪己诏”，我们那些满口“革命”的“党的领导”者，似乎连这一点雅量都没有，他们怎么可能同意建立这样的纪念碑！

事实正是如此。例如，巴金老人曾建议建造“文化大革命”博物馆，这决不

会得到有“毛主席的红卫兵”背景的“党的领导”者的同意，所以几十年过去了，巴金老人也带着未了心愿遗憾离世了，这个建议至今还是“泥牛入海无消息”；一处民间自发建立的“文革博物馆”，也在“党的领导”下被砸烂了。据杨显惠 2003 年所著《夹边沟记事》一书披露，甘肃酒泉内一个叫“夹边沟”的劳改农场，曾集中了 3000 名右派，最后的幸存者只有几百人，甘肃的五七难友们集资在夹边沟建立了一座纪念碑，不久也在“党的领导”者的指挥下被彻底捣毁……

最令人深思的是，在中国大陆至今仍不断重复背诵毛泽东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时，俄国人早已把“十月革命”正名为“十月政变”。我国一些热衷“党的领导”的政客，至今仍在为苏联的崩溃深感惋惜，并哀叹“竟无一人是男儿”时，俄国人却公开指责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卖国，不断揭露斯大林“领袖独裁”实施的暴力专政罪行。当中国大陆“党的领导”者拒绝建立“文革博物馆”，并砸毁“夹边沟”右派劳改死难者纪念碑时，俄国在 1991 年的议会上决议，每年 10 月 30 日为“政治镇压受难者纪念日”，官方要举行盛大的纪念仪式；2017 年 10 月 30 日，还专为纪念政治迫害遇难者建造的“悲伤墙”举行揭幕式，国家领导人普京参加了仪式并发表讲话。这是一座弧形的整体墙，长 35 米，高 6 米，上面雕塑了许多凹凸错落、面容模糊的人像，构成一把巨大的镰刀图形，象征着“党的领导”下的国家机器，是怎样像镰刀割草一样草菅人命的。

“悲伤墙”的艺术表现方法，使我又一次想起罗丹的青铜雕塑《地狱之门》。它是罗丹根据但丁的《神曲》构思创作的作品，门的上部正中，塑有一个强壮有力的男性巨人，他就是蹲在地狱入口处，满怀感情、托腮沉思的“思想者”，他垂头默默凝视着 187 个人体，在痛苦挣扎中潮水般地涌入阴森沉郁、令人恐怖的地狱，所表现的主题是：“你们来到这里，放弃一切希望！”

也许是一种巧合吧，俄国人在莫斯科为“悲伤墙”揭幕式的日子，正是毛泽东赞颂的并影响中国人命运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一百周年的日子。我们曾经一再强调“以俄为师”，建国更是坚持“全盘苏化”，为什么俄国人现在能“以史为鉴”，建立了纪念政治迫害受难者的“悲伤墙”，我们却拒绝建立“文革博物馆”，要捣毁右派死难者纪念碑？

五

或曰：我们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不是已经建立了“人民英雄纪念碑”，还需要再建什么类似的纪念碑么？

当然要，因为这是完全不同时代、不同性质的两回事，前者根本不能取代后者。

“人民英雄纪念碑”，是 1949 年 9 月 30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议建立的，并于当天下午举行了奠基典礼，可以说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相伴而生，具有强烈的政治寓意：它标志着国民党执政的“中华民国”在大陆统治的终结，和共产党执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始。这座高 37.94 米的石碑，四周环绕两层汉白玉栏杆和台阶，碑座镶嵌八块巨大的汉白玉浮雕，反映的历史事件是：“虎门禁烟”、“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

“南昌起义”、“抗日游击战争”、“胜利渡长江”；在“胜利渡长江”浮雕两侧，有“支援前线”、“欢迎人民解放军”装饰性浮雕。碑的正面是毛泽东的题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背面有毛泽东撰稿周恩来书写的碑文：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我们当然不能要求一座纪念性的石碑与历史完全等同，但是这里的碑文与浮雕具有明白无误的历史内涵：突显的是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开始，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历史的定格，此前和此后均不属于纪念的范畴。正如史学界广泛承认的论断：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所以，这座纪念碑体现的是胜利者的历史观，强调的是共产党的革命功德，和“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执政理念。例如，浮雕以敌后的“游击战争”表现抗日战争，便难免使人产生困惑：长达十多年的抗日战争，其正面战场和前线又在哪里？其胜利仅仅是依靠游击战争打出来的吗？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大可不必深究，因为至少“游击战争”也是抗日的一种军事行动。所以，当我们看到党国要人，在重大节日在“人民英雄纪念碑”隆重举行献花典礼时，我们只能产生这样的印象：这座纪念碑是为特定时代和特定对象而建造的，它可以说是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念碑，所传达的信息是，共和国是共产党打下的天下！

现在需要探索的问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年了，当大陆的社会基本矛盾，不再是广大民众与国民党官僚统治的矛盾后，是否仍存在新的“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的“历次斗争”？除了对外的武装斗争外，和平时期的斗争主要内涵究竟是什么，在斗争中产生的值得纪念、缅怀的牺牲者又该如何认识与对待？

这些，都超越了“人民英雄纪念碑”所规定的特定时代与特定对象范畴，需要作出新的回答，因而更具有深远的值得纪念的历史意义。

六

让我们从两则官方的权威文献说起。

中国共产党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有几句话为我们探讨上述问题提供了值得深入思考的线索：

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我们党对封建主义特别是对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绅恶霸进行了最坚决最彻底的斗争，在反封建斗争中养成了优良的民主传统；但是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

邓小平于 1980 年 8 月 18 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过一次讲话，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经政治局 1980 年 8 月 31 日讨论通过。

在这篇讲话中，谈到党国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时，也讲过这样的话：“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他对这些现象都作过扼要的分析：

一、官僚主义现象：“它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

二、权力过分集中现象：“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变成个人领导”；“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

三、家长制现象：“除了使个人高度集权以外，还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这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生”；

四、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同封建主义的影响有一定关系，……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能是无限期的”；

五、特权现象：这种现象“给群众造成很大灾难”，“一些干部，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公仆，而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主人……势必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发生腐化。我们今天所反对的特权，就是政治上经济上在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权利。搞特权，这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未肃清的表现”。

上述两则官方权威文献透露的信息，都心照不宣地、有意无意地让人看见了毛泽东的影子，这几乎是公开的秘密。它的主要价值，在于它是在毛泽东的生命及其心仪的“文化大革命”几乎同时终结后，较早用官方权威文献的形式，正式承认了建国之后的共产党政权，与历史上的封建专制主义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但只不过是一种“遗毒”、“残余”和“影响”罢了。

事情真是这么简单的吗？答案是否定的。

上述论断虽然没有进行理论上论证，更多的只是现象与事实的描述，但都勾勒出封建专制主义的构成元素及其政体的基本形态，使我想起《论语·颜渊》中的一段话：“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那以后，孔子的这八个字，就成了封建社会“为政”的基本要求，即做到君之所以为君，臣之所以为臣，父之所以为父，子之所以为子。这里涉及的两种关系，君臣关系，父子关系，这种关系都有严格的使之“之所以”的规定性，有其法理与伦理加以维护，并在此基础上演化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这种“君、臣、父、子”之间，各自有“之所以”必须遵循的原则。在这两种关系的基础上，构成两种制度：君主制和家长制，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前者则是后者在国家层面上的发展，所以君称父，民称子，“君父民子”就是这么来的。“家长制”可以说是早期的奴隶制，即家长对家庭成员与私有财产拥有绝对支配权力，君主制则对国家成员和“天下”拥有绝对支配权力；形成“普天之下，莫非

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统治观念。于是，以君权为中心的专制集权政体，和以父权为中心的宗法组织，两者结合为一整套“明君、贤臣、顺民”为理想的封建政治格局。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形成的封建专制政体，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在官民对立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基础上，以“打天下、坐天下”为特征的“改朝换代”，各个王朝的更替是在同一封建专制政体形态下进行的，直到“民国”仍然如此，所不同的只是“包装”；“一朝天子一朝臣”，君主通过文武百官对百姓施以压迫与支配的权力的转移，都不改变旧有的政体基本形态。在这种专制政体形态下，各个王朝均把广泛的社会文化现象，诸如伦理、宗教、法律、艺术以及学术、思想、教育等社会文化领域，全部纳入其君主政体的“天罗地网”格局之中，成为为统治者服务的政治工具。故以秦始皇“焚书坑儒”为发端的文化专制主义，使各个王朝都贯穿“奠于一”的有“独尊”地位的“指导思想”，造成各种不同形态的“文字狱”，中国民众世代生活这样的“官方学说”之中，也养成了特别适宜于封建专制主义的精神与气质，习惯了把自己的命运，交由“真命天子”、“太平宰相”、“青天老爷”去支配的“人治”传统。在这种专制制度下，是没有“民主”可言的，中国古代文献中的“民主”，指的是“为民做主”，就是邓小平所说“人民的主人”之谓，并非“西学东渐”后所说的“德先生”。邓小平在上面指出的“官僚主义”、“中央高度集权”、“个人领导”、“家长制”、“一言堂”、“个人崇拜”、“领导职务终身制”、“特权”、“腐化”等等弊端，都可以从封建专制社会的特征中找到其历史源头。

七

政治学家、经济学家、《资本论》的翻译者王亚南先生，应英国以研究中国科技史著称的李约瑟教授的要求，经过数年的研究，于1948年出版了《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对我们在上面简略提到的封建专制政体作过详细的论述。1949年，国民党蒋家王朝在大陆崩溃，败走台湾。王亚南在该书的末篇，曾满怀感情作了如下预言：五十年代将是一个科学的、人民的时代，那时作为中国官僚政治社会基础的封建专制体制已被清除，官与民的对立的社会身份关系已被洗脱，人民特别是工农大众，自觉地参加了政治革新运动，官僚政治就到了真正寿终正寝的时候。

那以后，他热情地投身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对当初他的预言充满热忱与期待，没有对中国的官僚政治作进一步研究。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正直、诚实和有建树的科学家，却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残酷的政治迫害，在“文革”高潮1969年11月13日含冤病逝于上海。在最后的日子里，他对当年所作关于“科学的、人民的时代”的预言作了修正，以沉痛的语言说，过去的一位西哲讲过，专制制度下只有两种人：一种是骗子，一种是哑子；现时的中国就有专制制度的味道，是少数骗子在统治多数哑子！

被毛泽东“钦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并将他投进“党狱”的谢韬是我的老师，平反后任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又是我所任职务的“顶头上司”，

是一位率先在国内探索“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家，又是一位为我的同窗、难友丁弘所著《在历史的天平上》撰写序言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他倡导与题写刊名的《往事微痕》，为研究“反右运动”真相和探索其成因，以及发掘被人们渐渐遗忘的“右派分子”，累积了大量第一手真实的珍贵史料。在他的支持下，师母卢玉与铁流（黄晓枫）先生一起主持了《往事微痕》的日常编辑工作。她曾满怀悲愤地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与王亚南先生同样的感悟：

记得1949年10月1日，当“伟人”在天安门城楼，面对全世界人民庄严地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一时南北欢呼，天地动容。年轻一代的我们，更是激动不已，热泪盈眶，心潮澎湃，载歌载舞。大家紧握拳头举手发誓，为了祖国的繁荣昌盛，为了人民的幸福康宁，为了祖国迈上民主自由的坦途，我们纵是洒热血、抛头颅在所不辞！不料，忠诚坦白换来的是凌辱批斗，无私奉献所得到的是地狱人生，二十多年来泣血含冤，半世人生饥饿劳累。在那茫茫无边的黑夜，在那荒芜贫困的国土，你在问，他在问，我在问，大家在问：我们奋力营造的是红彤彤的世界，为什么得到的却是座黑沉沉的地狱？

凡是从那个时代过来而又良知未泯的善良人们，都在提这样的疑问，吼出觉醒的呐喊。千千万万蒙难死于非命者，也在惨烈的地狱的呻吟中，向历史、向后人，也向全世界维护人类生命尊严的人，诉求这种苦难，追求苦难的真相，探索苦难的成因。幸存者和死亡者都在问：究竟谁是真正的历史罪人？

这些，都以血泪斑斑的事实，印证了旅美政治学者冯胜平在致习近平的信上所作的论断：“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范围内吸引了无数向往自由解放的优秀分子，结果却开辟了一条通往奴役之路。它许诺人们以天堂，却把他们带进地狱。”

这里暂不详述在苏联发生的，以剥夺农民土地与粮食支配权造成的大饥荒，和在斯大林制造的对他的“个人迷信”，及他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进行血腥屠杀的“大疯狂”；也不说他怎样对知识分子长期执行的文化专制主义，完全剥夺了民众的民主与自由的权利，以致官僚统治集团因彻底腐败被民众完全抛弃而彻底崩溃；

这里不说，按“苏联模式”建立，并受苏联政治、军事控制的东欧那些“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最终因苏联垮台产生的骨牌效应也很快随之垮台；

这里不说，北朝鲜怎样在共产党（劳动党）的领导下，宣称要建设让人民享受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却在斯大林、毛泽东的支持下，悍然发动对韩国的侵略战争，不仅使北朝鲜人民深受苦难，至今仍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而且由“无产阶级专政”的“党天下”，蜕变为以个人独裁为特征的、祖孙三代世袭的“金家三朝”的“家天下”；

这里也不说，小小的柬埔寨共产党（“红色高棉”），在武装夺取政权后，其头目波尔布特宣称：“中国的毛主席，也是我们的主席！”他亲到北京聆听毛泽东的指示，要按“毛泽东思想”建设一个没有商品、没有货币的“社会主义”社会，结果不单造成生产、生活的大破坏，还以屠杀百万之众的百姓而震惊世界，最

后遭到垮台受到审判，被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这些发生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政治事件，都存在有内在联系的共同特征：共同的政治信仰，共同的“党的领导”，共同的执政理念，共同的漠视人权，最后将是共同的彻底垮台！

从这些共同特征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避免再次发生类似的人间悲剧，是摆在世界人民和历史学家、政治学家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八

这首先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重大课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1949年6月3日，已经“进京赶考”的毛泽东，以胜利者的口吻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宣布了他的执政理念：“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并引用宋朝哲学家朱熹的话说，这叫“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里的所谓“道”，毛泽东的解释是“独裁”或“极权主义”，并说明这是从“蒋介石的反革命独裁”那里学来的。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关于“民主”，我在前面已经提到，不妨再重复几句：在共产党的政治用语里，“民主”在书面意义上，可以解释为“人民当家做主”，即“西学东渐”之后所说的“德先生（Democracy）”，而在实际运用中，就不是这个意思了，指的是中国古代文献中早已出现的“民主”概念，应解释“为民之主”，或曰“你当家，我做主”；邓小平把它解释为“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主人”，非常准确的阐述了共产党在实际运用中的“民主”。根据建国后的大量事实看，毛泽东所说的“人民民主独裁”，其实就是“为民之主者的独裁”；

二、毛泽东曾用诗的语言说明，秦始皇所建立的封建集权专制制度，是古今一以贯之的政治制度，这就是毛泽东所吟唱的“百代都行秦政治”的真正涵义。不仅历代王朝如此，“中华民国”的“总统”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也是如此，这就是他所说的“人民民主独裁”（即“为民之主者的独裁”）是从“蒋介石的反革命独裁”那里“学来”，实际上是“继承”来的根据。

后来，毛泽东更用明白无误的语言，毫不隐瞒的承认，他的执政理念可以概括为一句话：“秦始皇+马克思”。邓小平在指明国家领导制度存在权利过分集中现象时说：“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变成个人领导”，“这种现象，同我们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这里所说的“共产国际”，显然不是马克思的“国际”，而是列宁斯大林的“第三国际”，所以学者们对毛泽东的这句话，非常一致、不约而同的解读为“秦始皇+斯大林”，这更符合毛泽东的实践活动。

这样，邓小平就完全正确地解释了毛泽东所坚持的国家领导制度的性质：“秦始皇”指的是“封建专制主义”，“斯大林”指的是共产国际普遍追求与贯彻的“无产阶级专政”。按列宁的论述，“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残酷和血腥的，不受任何限制，也绝不受法律或规律拘束，直接凭借暴力进行统治的国家政权。毛泽东的“秦始皇+斯大林”，其实就是“封建专制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文化大革

命”终结后，学界相当一致的把“秦始皇+斯大林”称之为“封建法西斯主义”；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苏联的“大疯狂”，都非常典型的体现了这种具有封建特征的法西斯恐怖与独裁。你要懂得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吗？你就看看“文化大革命”中“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左派”们的所作所为就知道了，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剖析“无产阶级专政”的鲜活标本！

现在，经过长达 70 年的腥风血雨，和以牺牲千千万万人的生命为代价，我们终于读懂了毛泽东所说的“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民主独裁”的真正涵义了。

这种性质的专政，绝不可能产生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理想和民主政权。中国共产党自称是无产阶级先锋队，走的却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实际上是打着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旗号的农民暴力起义，它在意识形态和行为方式等方面，都带有浓厚的小农经济特点。中共“历史决议”中说：“我们党对封建主义特别是对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绅恶霸进行了最坚决最彻底的斗争”云云，无意中透露了个中消息：这样的“反封建”，不过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出现的“打土豪、分田地”而已，不可能动摇封建主义的根基，也完全“彻底”不了，一旦满足了“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私愿，封建主义就会以另一种方式复活，这是由历代农民革命战争史实所证明了的。特别发人深思的突出例证是：中共中央在关于建立农村人民公社决议的红头文件中，破天荒的公开宣称，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并非太远的事。这种把共产主义建立在落后的小农经济基础上的社会观念，不过是“太平天国”的现代翻版，甚至比“天国”还要“天国”。与这种建立在小农经济上的共产主义相适应的，只能是具有浓厚封建意识的社会理念，那就是“打天下，坐天下”的“改朝换代”，革命斗争的结果不过是产生一个新的封建王朝，坐上皇宫龙椅的人必定是金口玉言、不受法律和群众监督，拥有绝对权力的“皇帝”，这还有什么问题吗？

事实也正是如此。毛泽东曾私下对其亲属毛远新说：“想监督共产党？笑话！天下是谁打下来的？”因为是“私下”，所以它最充分暴露了毛泽东的“党天下”心理，所谓“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与历史上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同一个意思。“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的绝对权力达到了顶峰，他的话成了与“圣旨”同义的“最高指示”，“毛泽东思想”也就成了“金科玉律”。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并非像王亚南先生预言的那样，出现一个“科学的、人民的时代”，作为中国官僚政治社会基础的封建专制主义体制并未清除，反而经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包装得到加强；官民对立的基本矛盾，虽然官方一再用“阶级矛盾”加以掩盖，但实际上反而越来越尖锐，“官逼民反”的事件也越来越多。人们在渡过短暂而虚幻的欢乐后，很快发现自己仍然站在一座新的“地狱之门”前，等待他们的是更加悲惨的命运！

所以，中共中央的“历史决议”和邓小平关于党国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在提到“封建专制主义”时，认为仅仅是一种“遗毒”、“残余”和“影响”之类是说不通的。单就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浩劫”，单是一点点“遗毒”、“残余”和“影响”，够用吗？事实证明，根本问题在我们的政治体制，即是历史上封

建专制主义制度的延续，又是苏联斯大林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再版，二者“土洋结合”，就杂交出毛泽东的“秦始皇+斯大林”执政理念，形成具有强烈封建专制主义色彩的“党天下”混血儿怪胎；至今为止，我们仍很容易在现实生活中发现这种有“中国特色”的怪胎影子。

这应该是我们观察“反右运动”性质的基本立足点。

九

毛泽东把 1957 年的“反右运动”定性为是一个“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同年 11 月 17 日，他进一步说：“我国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有人认为是 1956 年，我看实际上是在 1957 年。1956 年改变了所有制，这是比较容易的，1957 年才在政治上、思想上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自认为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但上述这些说法都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马克思有段经典性的论断：“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力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这个论断说得很清楚；用浅白的话说就是，正在成长的事物远未达到发展极限时是不会衰亡的，正在孕育的事物在尚未成熟前是不会降生的。事物的衰亡和降生，都有其瓜熟蒂落的自身规律，不能用外在的人为行动干预其过程。毛泽东的所作所为，就是在根本不具备者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条件下，人为地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进行强制性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把正在发展的事物人为的扼杀在摇篮里；而对尚未孕育的“社会主义”，却像强迫处女生孩子那样希望降生出英伟的宁馨儿。这样的结果，只能造成生产力的极大破坏，因而根本不能称之为“社会主义革命”；经济上如此，政治思想上也是如此，把 1957 年“反右运动”称之为“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就像把哈哈镜里被扭曲的形象，当作真实映照的实体自身一样。对经济基础的理解上的荒谬，必然造成对上层建筑的理解上的荒谬。毛泽东一厢情愿地，把他具有小农意识的虚幻的“社会主义”，强加在刚刚摆脱国民党腐败统治的中国人民头上，使官民对立的基本矛盾，又日益激烈的以新的形式发展起来了。

内战时期，共产党为了推翻国民党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一党专政统治，曾以承诺成立“联合政府”、实行民主与自由为号召，因而受到人民群众和民主党派的信赖和拥戴，满怀期待的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共产党会兑现自己的承诺，让中国进入王亚南先生所预言的“科学的、人民的时代”。出乎意料的是，毛泽东给这种期待泼了一盆冷水，他的承诺不单未能兑现，反而宣布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民主革命的完成，要在“党的领导”下向社会主义过渡了。对此，连一向大力支持共产党的宋庆龄也提出了疑问：经民主党派

一起政治协商的“共同纲领”还算不算数？毛泽东以自己的行动回答是：不算数了。他拿出的是未经民主政治协商，由他单方面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强行推动一系列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政策。

人们很快发现，共产党以暴力推翻国民党“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一党专政”并建立了共和国后，立即把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的政治遗产完全继承下来，开始在全国大力推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一、以“党的领导”与“无产阶级专政”为核心的全面政治垄断；二、以“消灭私有制”与“实行计划经济”为核心的全面经济垄断；三、以“遵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与“文化专制主义”为核心的全面思想垄断。这样一来，毛泽东的“秦始皇（封建专制主义）+斯大林（无产阶级专政）”的执政理念得到了全面贯彻，人民则完全丧失了民主与自由的最后一丝空间，全都被异化为供党驱使的“驯服工具”（实际是会说话的工具——奴隶），任何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头上都高悬着“党的领导”与“毛泽东思想”这种“尚方宝剑”，成了毫无尊严的非人！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政治思想战线的革命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这里根本不是什么“社会主义革命”，其实质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方的封建专制主义，和以“思想者”——知识分子中的觉醒者为代表的另一方的民主主义之间的大搏斗！

十

“反右运动”发生在1957年，但早在建国初期，毛泽东还没有运用“右派”这个政治概念概括反抗“封建专制主义”的革命者之前，民主革命的先驱者已经开始思考了，而毛泽东也开始对他的批判者用专政手段实施迫害，只是还没有达到“运动”的规模。此时革命的批判者自身也处于不完全自觉的状态，头脑里还存在不少期待于党国的幻觉，斗争也只是在个别领域以“散兵游勇”的行为方式出现的。例如，顾准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最值得后人缅怀的一位勇者，也可能是全国唯一被两次（1957年、1965年）打成“右派”的革命者，一位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因追求真理并投身革命，建国后在上海从事经济工作并身居要职的老共产党员。1952年，他便因“目无组织，违反党的政策方针，思想上、组织上与党对抗”，被扣以只有在毛泽东式的“法典”中才有的“恶劣分子”这种莫名其妙的罪名，受到撤职处分。这时，他进行的思考与批判，还只限于经济领域。经济学家孙冶方，在学术思想上一直坚持按价值规律办事和强调市场经济的重要性，讲过“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是第一规律”的话，因而受到长期的围攻与批判。他晚年曾感叹说：“我的学术思想，最初是得益于顾准的影响”。我们从这句话，可以猜测出顾准之所以获得“违反党的政策方针，思想上、组织上与党对抗”罪名的来由，实际上说明他在反抗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经济垄断”中，打响了最先的第一枪。随着思考的深入，他的批判逐渐扩展到哲学、历史、政治等广阔领域，放射出更强烈的民主主义革命、反对封建专制的思想光辉。他被“党的领导”者迫害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但在晚年仍坚贞不屈，更加鲜明的宣告了他的政治信念：“当今天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

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权威主义会扼杀进步，权威主义是与科学精神水火不相容的，民主才是必须采用的方法。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保证人类的进步，也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打破权威主义和权威主义下面恩赐的民主。”他最后于1974年孤独的与世长辞，享年不足六十。我们从他身上不难看到，伟岸矗立在中华大地上的所谓“右派”，究竟是怎样一群具有民主革命理想、怀有高尚情操的大写的人！

如果说顾准是建国初期最早反对“经济垄断”个案的话，1955年的胡风及其追随者，则是最早挑战“思想垄断”和文化专制主义的代表人物，毛泽东称之为“胡风分子”，实际上是被毛泽东定性为“反革命”的没戴“右派分子”帽子的“右派分子”。这是一群有理想、有道德和有才华的文艺工作者，其中很多人在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斗争中支持乃至投身革命参加了共产党；胡风更是一位受到鲁迅信任的进步作家，他在文艺理论方面的造诣，为“党的领导”在文艺界的“大人物”所不及，因而受到许多青年作家的尊敬。他们对“思想垄断”进行的思考与挑战，仅仅限于文艺层面，并未涉及广泛的文化和政治领域，采取的不过是“仅供参考”的正常书面建议形式罢了。问题在于，胡风的建议书的关键，是他触犯了被官方奉为“金科玉律”，必须遵循的根本指导思想性文献，即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胡风在私下通信或谈话中，把毛的讲话鄙之为无甚高论的“被人当作‘图腾’的小册子”，他为繁荣文艺所提建议，也违反了现实为贯彻讲话精神所作的具体部署，这就直接打了毛泽东的脸，于是龙颜大怒，拍案而起并“御驾亲征”，其结果是在中国又出现了一个“反革命”新品种，即由毛泽东“钦定”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并且不经法院审判使用专政手段把他们投入“党狱”，罪证不过是些从未公开的私人信件罢了，而胡风及其追随者却为此含冤二十多年，当他们在毛泽东死亡后得到平反时，胡风也离天国不远了。毛泽东的御笔，彻底毁掉了这群优秀人才的一生！

时隔仅仅两年，政治空气中还弥漫着批斗“胡风分子”的硝烟，1957年的“反右运动”便“闪亮登场”了。这是一场空前的政治阴谋，毛泽东称之为“阳谋”，按公安系统的行话，这属于“钓鱼执法”，即用诈骗、伪善和谎言引诱你“犯罪”，等你“上钩”后，他再以“执法者”的身份对你实行“专政”。

在此不久前，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中，对党内长期盛行的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进行了批判，并揭露了斯大林利用这种迷信，以“领袖独裁”所施行的暴政制造的“大疯狂”，让骇人听闻的流血惨案真相大白于天下。很多人对共产党的光辉形象，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苏联人民所享受的民主与自由的幸福生活等等，都开始产生前所未有的怀疑。作为国际共运的领袖与列宁接班人的斯大林，此前在向往社会主义社会的进步人士中享有的崇高威望，也渐渐在人们心目中特别是知识分子中开始崩溃；对一向标榜无比优越的“无产阶级专政”，也感到有了越来越多的困惑。理所当然的，人们对一向以“第三国际”最好的支部自诩的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又一直宣扬“一边倒”进行“全

盘苏化”，热情地向中国人灌输“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社会主义”理想，并多年来与苏联共产党与国际共运领袖的斯大林，有着千丝万缕思想与组织联系的毛泽东，不可避免地要根据建国以来的实践活动，对照苏共和斯大林已暴露出种种弊端重新加以验证与思考，结果发现二者竟有如此之多的相似之处，涉及政治、经济和思想等各个广泛的领域，于是渐渐从瞒与骗的迷雾中觉醒过来，开始探索事实的真相了。

纵然如此，人们并没有把二者完全相提并论，由于历史的惯性，他们仍然信任与支持共产党，愿意接受党的领导。所以，当中共中央决定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时，人们真诚希望党能克服这些缺点，满怀“帮党整风”的善意，对党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批评意见。即使有的语言尖锐一点，态度激烈一点，但没有人想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和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更没有人有想取而代之的政治野心；他们的尖锐语言和激烈态度，只能说明他们对共产党的真诚信任，特别是知识分子，他们中间很多人虽有忧国忧民的士者传统，但对经济仕途却有敬而远之的旧习，更不想谋其位而参其政，只不过希望党在改进存在的缺点后，更好地领导全国人民把国家建设好，让人民生活得好，出发点是毫无问题的。邓小平为了证明“反右”的必要性和正确性，声称“右派分子杀气腾腾”云云，但为此不准摘帽的“右派”又是“极少数”，这个“极少数”又怎么能制造出“杀气腾腾”的气氛来？这种不通的语言与逻辑，只不过证明毛泽东与共产党当时完全听不来自人民正确批评意见。反映了一向习惯了“一言堂”的“党的领导”者，对群众觉醒的民主意识深感恐惧不安罢了。

根本的问题在于，来自群众的批评与建议，远远超过了共产党设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藩篱，带有明显的全局性，即不单涉及文化、思想和经济领域，更涉及广泛的政治领域。从作为个体的人看，他们的意见肯定是不完备的，片面性难以避免；但如果把所有个体的人提的意见综合起来考察，那将是一部反映群众关于治国智慧的“百科全书”，不仅当时有很强的针对性，对现时也有其值得重视的价值。历经数十年的检验，今天重新看看他们当年的意见，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性，他们不仅论及当时，也论及现在，其中不乏超前的远见卓识，如共产党有可能产生特权与腐败现象，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可能产生的后果提出预警等等，证明他们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

更为重要的是，那些涉及政治领域里的批评意见，相当集中的指向封建专制主义与党的领导之间的联系，指向毛泽东的个人迷信与领袖独裁的关系，具有鲜明的反封建专制主义的民主主义色彩。这就碰到了毛泽东的“红线”。仅就我当时在北京的所见所闻，北京师范学院有张题为《“民主”乎？“党主”乎？》的大字报就相当吸引人眼球，时隔多年，所写内容已经模糊，但这个标题提出的质疑，至今仍然是个有待解决的悬案：我们口上讲的是“民主”，行动做的其实是“党主”，这种“党主”是以“党的领导”名义表现出来的，这就直接否定了真正的“民主”。这种对“民主”与“党主”之间的矛盾质疑，正好呼应了储安平所说的“党天下”，相当准确的回答了问题的实质。清华一张落款为“人们会理解，我不会签

名”的大字报，则直接把毛泽东称为“皇上”说：“皇上哟！你的一句话牺牲了多少人的理想和愿望哟！皇上哟！秦始皇与你相比，也只能是个无名小卒了，无怪乎说：‘秦皇汉武，略输文采’，你在镇压人民这方面，是胜过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多少倍了。”这就直接揭露了毛泽东“秦始皇+斯大林”真实面目。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的所作所为，更是比“皇上”还“皇上”，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邓小平以自己的亲自感受，于1980年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出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提到的许多弊端，虽然明显与毛泽东有关，但他只轻轻提了一下“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不敢正面把这些弊端与毛泽东的“秦始皇+斯大林”相联系，而早在1957年的“右派言论”中，就把这些弊端清晰地指出来了，而且比邓小平讲的更深刻、更全面，带有鲜明的预见性。但所有这些深刻、全面、有预见性的正确意见，全都被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恶毒攻击”，提意见者都成了“阶级敌人”。储安平所说的“党天下”，如今也是公开的秘密为人普遍认知，但这位建国前即以其主编的《观察》杂志，与国民党腐败统治进行斗争的民主进步人士，后来却因“党天下”的批评被迫害得死无葬身之地！

“反右运动”完全颠倒了对人对事的是非善恶观念，在毛泽东荒唐的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阶级立场”指导下，被定性为“反革命”和“阶级敌人”的所谓“右派”，成了一种判别是非善恶的标志：他们主张的正确意见，都是“反动”、“错误”的；相反，他们所批判的种种弊端，都是“革命”、“正确”的。在毛泽东看来，这种荒唐的是非善恶的全然颠倒，却成了他们所说的“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毛泽东的这种指导思想下，原本是应当予以克服的诸多弊端不仅未能克服，反而当做“革命”、“正确”的事物得到保护和发扬；原本是应当予以保护和发扬的正确事物不仅未能得到保护和发扬，反而当作“反动”、“错误”的东西遭到否定与迫害。结果是南辕北辙，毛泽东在邪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错误的泥潭中越陷越深，直到他引爆学界称之为“封建法西斯主义”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国人民被推进悲惨的“地狱之门”，仅仅由于他的死亡，人民才渐渐返回人间。所以有人公开撰文说：他早就该死。

十一

1979年，中共中央决定给“扩大化”的“右派”进行“改正”，长达22年的反右冤案，事实上已被否定，虽然还留有一条“返祖”性的不成比例的小小尾巴。这一事实证明，1957年奋起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封建专制主义”进行搏斗的所谓“右派”，是真正顺应时代潮流的民主革命派，他们中间的很多人虽遭到残酷迫害直到被夺走生命，但他们的精神是影响深远的。贯穿其中的基本精神，就是反对封建专制主义，诉求民主与自由。纵观建国70年来的历史，这种精神表现的越来越清晰，越来越自觉，它从建国初期早在“反右运动”前最初出现的少数如顾准这样的自觉者，到1955年带有群体性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和“反右运动”之后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76年的“四·五”运动，和1989年得“六·四”运动等，这种诉求的目的性越来越强，规模越来越大，我们从中都

可以看到“右派”的影响。这不能不引起“党的领导”者的极大恐慌，除动用武力进行惨无人道的血腥镇压外，也在意识形态上严加控制，在他们虚伪地吹吹打打宣称要遵守宪法的同时，却以官方“红头文件”的形式，明确把1957年“反右运动”、1959—1961大饥荒、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和1989年的“六·四”大屠杀列为“四大禁区”，不准人们对此“说三道四”、“妄议中央”，以致不惜动用专政手段钳制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一直发展到用卑鄙的“红卫兵”的“夺权”方式，以暴力强占敢说一点真话的《炎黄春秋》，把一个民办的受欢迎的杂志，变成了不受欢迎的“党刊”。官方这种不顾脸面的无耻行径，已经达到创纪录的空前程度。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毛泽东虽然死亡了，但他的阴魂一直在大陆“闲庭信步”，“返祖”现象也越来越明显，“秦始皇+斯大林”的幽灵，也充斥在中国大陆的政治舞台上，空中弥漫着浓厚的复辟气息，在重新把毛泽东捧上神坛之后，又在按他的形象，妄图“克隆”出一颗新的“大救星”！

这种“捣鬼”之术确实有效，使很多青年人竟然不知“四大禁区”所谓何物，妄图用“遗忘”的办法，抹杀真实存在的历史，但历史是不能抹杀的。无论官方怎样掩盖历史真相，但真相终究会大白于天下。这跟如下两种情况密切相关：一、“右派分子”的精神影响已深入人心。在这种影响下，由“反右运动”所产生的连锁反应，也渐渐波及其它广泛领域。如官方曾大力宣传“1957年反右的政治之花，结出了1958年的经济大跃进之果”，但接踵而来的却是三年大饥荒，饿死了数千万人，一些政客文人一直玩弄鼓吹没人饿死的谎言策略，也无不被人当场揭穿而宣告破产，证明了当年“右派”批评的正确，和“反右”带来的严重后果；二、我们有一批不畏强暴勇于追求真理的“中国脊梁”式的人物。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是从小营垒中冲杀出来的，属于体制内的老干部、老党员，由于亲身经历了建国后的“全本”过程，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泛滥及毛泽东“秦始皇+斯大林”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有切肤之痛，因而“离经叛道”反戈一击，往往显得格外准确有力。在他们的推动下，很多虚构的历史被揭露，很多真实的历史被还原，而且搜集整理了大量为统治者所掩盖和歪曲的真实史料，为后人认识我们这个时代的面貌创造了有利条件。

除武宜三先生主编的本书《1957年受难者姓名大辞典》外，仅我接触到有关主要文献就有：

《往事微痕》谢韬师题写刊名，铁流与师母卢玉主持编辑工作。刊头用十六字宣告了办刊宗旨：“拒绝遗忘，正视历史，支持改革，促进民主”。杜光先生的评语是：“反映了‘右派’难友的苦难与觉醒，揭露了专制主义的暴行和罪恶”。

《往事微痕》后遭专政机关抄查，铁流被逮捕，年逾八旬的他被脚镣手铐地驱逐北京发配到四川老家；

《万名右派简录》岑超南主编并作序。序言中说，1957年的所谓“右派”，其要求是反封建、反独裁，代表着广大工农大众的民主要求，自然是真正的“左派”。他们是不畏强权、爱人民、爱祖国、争民主的战士，应该正名为“五七民主派”，对无辜处决、折磨致死的人，应追认为“五七民主烈士”。1957年的整

风反右运动，是中国人民民主运动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又是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文字狱，它进一步把中国拖进专制独裁的深渊，为“文化大革命”和“六·四”大屠杀准备了条件，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灾难；

《1957年的革命与反革命》杜光著。本书为论文集，是一本研究与讨论1957年反右运动的著作，由“一九五七年学”的倡导者钱理群教授作序。作者认为，1957年的民主运动，是对新中国建立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所作的第一反应，他既承接了五四为代表的民主运动传统，又是共和国建立后的第一次民主主义运动的展示，并开启了以后绵绵不绝的民主运动的先河。钱理群强调了本书的三个主要贡献：一、在揭示真相，分清是非上作出了自觉的努力；二、将1957年的民主运动放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高度去考察，给予历史的评价；三、对近年来右派维权运动的持续关注，表明不仅导致1957年的历史悲剧的专制观念、思维和体制在继续，而且反抗与斗争的火焰也没有熄灭，也在继续。上述三点，对构建“一九五七年学”具有奠基性的学术意义；

《昨夜西风凋碧树——中国人民大学反右运动亲历记》房文斋著。作者是我的同窗、难友，现为专业作家。扉页上的题词是：“献给在一九五七年民主运动中捐躯的烈士及受难者”。他说，写这样的文字，是为了“抢救记忆，保存史料，让年轻一代知道老一代知识分子的苦难历程和赎罪生涯，是多么的险恶和悲惨”。他认为，如果当局开明，稍有懊悔之意，不再掩耳盗铃，正确对待历史，就不需要我来唠叨了。他在写作中，常为触及伤心处而感叹唏嘘，潸然泪下；

《墓碑》杨继绳著。作者在深入调查研究基础上，对1959-1961年发生的大饥荒进行了剖析，并引用中外人口学家的研究成果，认为大饥荒年代饿死大约3600万人（这是各家研究者提出的饿死人数的中间数）。他在文章中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作为国家计生委副主任的周伯萍，在中国社科院人口所一次报告中提到，1961年他受命让各省填写一份有关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经汇总以后，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周恩来看到后立即通知：立即销毁，不得外传。杨继绳在书中对3600万做了个形象比喻，即相当于1945年8月9日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450倍；

《我为被饿死的同胞们哭谏》邹文奎编撰。这是一本有关“大饥荒”的专题资料汇编，是编者在阅读大量报刊的基础上，将有关资料整理编撰而成的。书的首页是编撰者上书党中央的信，提出三点请求：一、请求党中央查实三年被饿死的人数；二、请求党中央作出明确结论，是人祸造成了饿死人的事件，是党中央工作的严重错误，毛泽东对此应负完全责任；三、应诚恳向饿死者赔礼道歉，使死者家人或灵魂有个安慰，使活着的许多老人心里也感欣慰；

《血的神话——公元一九六七年湘西道县文革大屠杀记实》谭合成著，周实、杨继绳作序。1967年“文革”高潮中的夏秋之交，湖南道县周围县市发生了一场震惊世界的大屠杀。作者在搜集到的数百万字的资料，和近400个案例的基础上，写成这部55万字的纪实性报告文学，真实的再现了发生在“文革”高潮的这场血腥大屠杀。所写事实与场境让人惨不忍睹，在我阅读此书时，也不禁

失声痛哭、泪流满面。读罢全书我产生一个深刻的印象：这是一场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以“革命”的名义对生活在最底层的人民群众从上到下进行的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大屠杀。它虽然只是“文革”的冰山一角，却鲜明的揭露了“文革”的反动本质。杨继绳在序言中指出，大屠杀的根本原因是与毛泽东的极权主义相对应的专制制度，这种极权主义专制制度以强有力的中央统治为特征，通过对经济、政治、真理与信息的垄断，把整个社会囚禁在国家机器之中，对人民的整个生活实行无孔不入的统治；“文革”虽然结束了，但国家沿袭的仍然是“文革”前的官僚体制。如何通过血的教训，唤起民众对至今仍产生种种社会弊端的官僚体制进行思考与变革，是本书的基本价值；

《忘却的纪念——八九民运纪实》周良霄、顾菊英编著，扉页有“为中华民族自由民主而死难的同胞，魂兮归来！”的题词；书前有许良英的代序《“89”十年感言》，和编著者的《自序》。书中搜集了民运期间各种文字资料，包括编著者本人的亲历亲闻、当时的传单、新闻报道，以及八九年后海内外出版的官方和民间的有关著述，是研究这一历史事件的较为全面、系统的资料集。许良英认为，以“反腐败、争民主”为主要诉求的1989年以学生为主体的民主运动，以其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震撼了世界；这次体现了中华民族优秀品质的可歌可泣的群众自发运动，竟以血洗十里长安街为结局。编著者在自序中也说，“六·四”是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爱国民主运动，其参加人数之多，波及范围之广，政治口号之鲜明，延续时间之久，以及其全部过程的悲壮慷慨，连历史上的五四运动也几乎无法与它相比；它在世界历史上的伟大作用，是怎么估计也不算过分的。书中记录了赵紫阳的一次谈话中提到：“动用几十万大军，用坦克、机枪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广大人民，即所谓人民军队镇压人民，他不仅使中国人民失去了对共产党的信仰，使共产党失掉了党心、民心，也使共产党的组织涣散或者名存实亡，从而产生了信仰危机”。书中还记录了我在人大新闻系的同班同学丁子霖的有关资料，她因自己未成年的孩子在“六四”惨遭枪杀而奋起抗争，却因此被开除党籍和剥夺教学权利，后因成为享誉海内外的“天安门母亲”，又被国安部门定为“特控对象”。同窗、难友丁弘生前在致丁子霖的信中有这样几句话：“‘六·四’后的这二十多年间，人类社会，在中华大地上树立了一个精神的雕像，那就是‘天安门母亲’，他的代表人物就是丁子霖。试想，如果自己的孩子无辜受到伤害，作为母亲不做声，不敢做声，不能做声，这是一个什么社会？……问题是当权的暴虐力量，对这种母爱感到十分恐惧，特别是到了‘六四’这一天惶惶然。这是社会本质属性和发展阶段的标志。”

《北大魂——林昭与“六·四”》甘粹著，书名页有“献给为争取民主与自由而献身的英魂”题辞。作者在前言中写道：1989年北京爆发空前盛大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提出了民主、自由的口号。这次学生爱国民主浪潮的掀起，震动了全世界，是中国“五四”运动以来最为壮观的民主运动。这使他想起了1957年的情景，想起了林昭，认为林昭所具有的神奇魅力，在于她坚持真理、顽强斗争、

至死不悔的精神，就是科学、民主与自由，就是求索、为新、向上，就是勇敢、顽强、不屈地向旧势力抗争——这就是林昭精神所体现的“北大魂”。作者用时空交错的写作方法，把他与林昭在 1957 年同时划成“右派”，并在“劳动改造”中相识、相爱直到生离死别的感人悲剧，与 1989 年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民主运动“混搭”交织在一起，让人感到虽然二者时隔 32 年，仍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那就是反抗封建法西斯独裁专制。1957 年民主革命被“反右运动”镇压下去了，1989 年的民主革命是为了救弊于前者，不料又遭到血腥的屠杀。二者间的血肉联系所昭示的，正是林昭 1965 年 6 月 1 日在判决后的声明中所说：“历史法庭的正式判决很快即将昭告于天下后世！你们这些极权统治者和诈伪的奸宄——歹徒、恶赖、窃国盗和殃民贼子将不仅是真正的被告更是公诉的罪人！”

等等。上述列举的是我手边接触到的部分文献，已经明显涉及官方严查的“四大禁区”，从这些主要以“山寨文化”形式传播的内容中，不难明白官方之所查禁的原因，因为它们都鲜明地揭露了官方所坚持的封建专制主义及其给人们造成的深重苦难。但他们的查禁，并不能阻止这些真实历史事件，通过各自的渠道在人民群众中得到传播，并在人们心中深深扎下了根。这种事实也有力的证明了，1957 年的所谓“右派”，是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真正代表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革命派，他们当年对共产党和毛泽东提出的批评意见，是完全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愿望，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真知灼见。如果当年统治者稍稍明智一点，能多少听得进一点不同的声音，何至于造成人祸饿死几千万人，以至最后酿成不可收拾的十年“文革”浩劫？因此，如何认识当年的“右派”，并不仅仅关系他们的个人遭遇，更重要的是从他们身上所彰显出的关系国家和人民的命运。

因此，武宜三先生主编的《1957 年受难者姓名大辞典》，并不仅仅是一部资料性的工具书，更是一部当代史的重要典籍。它站在历史的制高点，把当代史的嬗变与延续尽收眼底：向后看，是人民奋起反抗国民党“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独裁专政；向前看，是人民反抗属于同一政体的“党天下”独裁专制；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专制”，与共产党“党天下”的“独裁专制”，二者之间既是“你死我活”的对手，又是亲如家人同一“血统”的手足兄弟，共产党毛泽东继承的，正是被人民群众赶下台的国民党蒋介石的衣钵，这是 1957 年受难者之所以受难的根本原因。我们从这一历史的制高点，不仅可以发现产生种种社会弊端的原因，也可从中探索中国今后应走的道路，找到从根本上清除封建专制主义的途径。由于书中的受难者除姓氏名谁外，还尽可能列有每个受难者当年的“右派言论”，当我们用之观察现实时，不能不惊叹他们的远见卓识，因此使本书既有厚重的历史内涵，更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1957 年的受难者，不论活着还是死去，他们都是顶天立地的真正值得纪念的英雄人物！

这就是我在本文开头，把武宜三先生比作中国的罗丹，在奋力雕塑中国“地狱之门”前的“思想者”和受难者的理由。杜光先生建议给丁酉蒙难者建立纪念碑，这是完全合乎民心的，而当前的“党的领导”者绝不会接受。但我在本文的阐述

的内容证明，丁酉蒙难者的纪念碑事实上已经存在，武宜三先生主编的《1957年受难者姓名大辞典》，就是一座纪念丁酉蒙难者的历史丰碑。武宜三先生所雕塑的中国的“地狱之门”，并不表现为物质性的青铜与石碑，而是表现为精神性的缅怀与祭奠，丁酉蒙难者及与其血肉相连的所有受难者，都会在这座用心铸造的丰碑中找到自己的历史地位。物质的碑文终有完全浸蚀的一天，而精神的碑文将会天长地久，这是一座深深植根于人民精神世界的心碑！

心碑献给中国“地狱之门”的思想者和受难者！

反封建专制主义并植根于民心的思想者与受难者永垂不朽！

(2019年3月22日于武汉东湖之滨。时年八十有五，入伍已七十年矣。)

yangmeiyun2007@163.com

【杨教，1956年中国考入人民大学，1957年发表《青年的个性发展和国家制度有矛盾》、《党有退化腐败的萌芽》等文章，被划为右派分子，受第二种处分：留校学习。】